

亞當·斯密思想解讀

Adam Smith

埃蒙·巴特勒 (Eamonn Butler) 著

趙根宗 譯

亞當·斯密思想解讀

Adam Smith

埃蒙·巴特勒 (Eamonn Butler) 著

趙根宗 譯

商務印書館

Adam Smith—a Primer

First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London, July 2007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4 The Commercial Press(H.K.)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亞當・斯密思想解讀

作 者：埃蒙・巴特勒 (Eamonn Butler)

譯 者：趙根宗

責任編輯：韓 佳

封面設計：楊啟業

出 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發 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印 刷：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樓A

版 次：201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2014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78 962 07 6538 4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作者簡介

埃蒙·巴特勒（Eamonn Butler）博士是亞當·斯密研究所（Adam Smith Institute）總監。該研究所位於英國倫敦，是專門研究市場經濟政策的智庫機構。他擁有聖安德魯斯大學（University of St. Andrews）經濟學及心理學碩士學位和哲學博士學位。

巴特勒博士最近的著作有《漫步自由市場》（*The Best Book on the Market*，2008年Capstone出版）、《佛利民思想解讀》（*Milton Friedman*，2011年Harriman House出版）、《亞當·斯密思想解讀》（*Adam Smith: A Primer*，2007年經濟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出版）及《英國衰敗狀況》（*Rotten State of Britain*，2009年Gibson Square出版）。

巴特勒博士早期的著作包括《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現代微觀經濟學革命的起源》（*Ludwig von Mises: Fountainhead Of The Modern Microeconomics Revolution*，1988年Gower出版）和《四千年通脹史：工資和價格控制為甚麼會失敗》（*Forty Centuries of Wage and Price Controls*，與羅伯特·L.許廷格（Robert L. Schuettinger）合著，1979年Green Hill Publishers出版）。巴特勒博士也曾

曾與梅森·皮里博士 (Dr. Madsen Pirie) 合著多本有關智商的普及書籍，由 Pan 出版社出版。自 1979 年起，他曾為亞當·斯密研究所編輯並與他人合著多本有關經濟及政策課題的出版物。

巴特勒博士定期在主要報章撰寫經濟學文章。他於 2012 年獲赫瑞瓦特大學 (Heriot-Watt University) 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Honorary D. Litt)。

序 言

我剛被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聘任為商業經濟學和商法教授（後簡稱為經濟科學教授），便於 1958 年受邀到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做講座。當時約翰·肯尼士·加爾布雷思（J. K. Galbraith）撰寫的《富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剛剛出版不久，書中對亞當·斯密有一些讚美之詞。肯尼士·加爾布雷思那時很搶手，因此，當我在哈佛的一位朋友安排我與加爾布雷思見面共進午餐時，他認為是辦了一件“漂亮的事”。為了讓我放鬆些，他說，“阿倫，當上世界上最尊貴的經濟學教授，感覺如何啊？”我給搞糊塗了，便解釋說愛丁堡大學教授這一職位起初是在 1870 年由愛丁堡商人協會建立和資助的，因為顯然人們認為經濟學家可以預測商業周期。“但是，”肯尼士·加爾布雷思說道，“你可一定要當這個教授，這可是亞當·斯密曾經當過的。”“不好意思，”我回答說，“我跟他所在學校不同、專業不同、時代也不同。”（眾所周知，亞當·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Glasgow University）先是當邏輯學教授，然後是道德哲學教授）午餐幾乎是不歡而散……

我對指出肯尼士·加爾布雷思的錯誤感到有些後悔，因為畢竟亞當·斯密跟愛丁堡頗有淵源，儘管他從未在愛

丁堡任教。他死後安葬在愛丁堡；並且，在墓地不遠處，我們很快就會看到蘇格蘭第一尊為紀念他而豎立的雕像。這得感謝亞當·斯密研究所所做的傑出努力，特別是埃蒙·巴特勒，也就是這本介紹斯密思想的書的作者——書寫得很精彩。而且，很多人都表示了解、欣賞斯密，並且作為蘇格蘭人，對他有種近乎於自家人的興趣，我和這些人一樣，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國富論》這本書上。我完全沒有意識到，對斯密而言，他寫的《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TMS*)不僅是其道德觀念的基石，而且，日常人們在與他人相互交往時會如何表現以及應當如何表現，對此眾說紛紜，該書也是其分析各種論調的基礎。

巴特勒博士寫的斯密簡介，再輔以甘迺迪教授(Professor Gavin Kennedy)的權威介紹，即使不為別的，至少清楚地表明其實從來就沒有甚麼“亞當·斯密問題”，也就是使其道德哲學和經濟分析保持一致的問題。這打破了現在還盛行的迷思：即斯密是“資本主義”(斯密本人從未在任何地方用過該詞)和投機活動的資產階級辯護者。這部分解釋了此書與眾不同的特徵之一：它非常重視對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有關人類行為的道德基礎的觀點進行解讀。這也是為甚麼巴特勒博士認為斯密根本上應當被看作社會心理學家的原因。

我已經充分表明，巴特勒博士寫的這本專著不僅僅是敘述人們所了解的斯密的生活和時代，而且其評註很新穎

獨特，這點專業人士也應仔細把玩。到此，我作序的任務就愉快地完成了，我可不想耽誤讀者像我一樣盡情享受此書的時間。

赫瑞瓦特大學 (Heriot-Watt University)

愛丁堡商學院公共金融學名譽教授

阿倫·皮科克 (Alan Peacock)

和所有經濟事務研究所出版物一樣，此論述表述的觀點均為作者個人意見，與經濟事務研究所（該所沒有集體意見）、該所管理託管人、學術顧問委員會成員或高級職員無關。

致 謝

感謝梅森•皮里博士（Dr. Madsen Pirie）和蓋文•甘迺迪教授（Prof. Gavin Kennedy）對此書提出的意見，感謝利斯•戴維斯（Lis Davies）對書中引用部分所提供的說明。

內容提要

- 一個國家的財富並不是重商主義者（mercantilists）所認為的那樣，是其國庫中金銀的數量，而是該國生產和商業貿易的總量，即我們今天所稱的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 在自由交換中，交易雙方都受益。如果他們預計交易會吃虧，誰都不會進行交易。因此，正如出口對其他國家很重要一樣，進口對我們也同樣重要。我們致富並不是必須要使其他國家受窮才行。其實，如果我們的顧客富有，我們獲益會更多。

- 商業監管毫無道理，並且效果適得其反。賦稅、進口關稅、出口補貼以及對國內產業的優惠政策會威脅經濟繁榮。

- 一個國家的生產能力取決於勞動分工以及資本積累，並且有積累才可能有分工。把生產分解為很多小步驟，每個步驟都由專業人員負責，產出就會大幅增加，從而使生產者有剩餘進行投資。

- 一個國家的未來收入取決於資本積累率。在更先進的生產工藝上投入越多，未來生產的財富就越多。

- 在自由貿易和競爭情況下，市場會自動調節，始終

把重點放在最迫切的需求上。如果商品稀缺，人們就願意多花錢來買。於是，提供這些商品就會有更多的利潤，結果，生產商就會投資生產更多商品。

- 如果有公開、競爭性的市場，人們可以自由交易，沒有強買強賣，那麼，財富增長就最快。必須有國防、正義和法治來維護市場的公開性。自由和自利並不會導致混亂，而是好像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指引似的，走向秩序和和諧。

- 既得利益者會利用政府權力扭曲市場制度，牟取私利。僱主和從業者可能會推動出台打壓競爭的種種規章，如阻止人們從事特定行業的進入壁壘等。

- 稅應當按收入依比例徵收，並應當定明數額，方便繳納。徵稅成本要低廉；稅收不能妨礙經營，也不應太過繁重以誘發逃稅。並且不能規定收稅人員須頻繁來訪查稅。

- 人類都有“同情”（確切地說應為情感共鳴）他人的天性。它會使人們節制自己的行為並保持和諧。它也是人們對行為進行道德判斷的基礎，以及人類美德的泉源。人性比激進分子和空想家過於自負的理性能更好地為建立和諧的社會提供指導。

導 論

蓋文·甘迺迪 (Gavin Kennedy)¹

埃蒙·巴特勒撰寫的亞當·斯密簡介一書介紹了斯密的生平和思想，該書精彩又富有權威性，在我了解之中，它在已出版的介紹斯密的小冊子中是最好的。任何人讀完後都會了解斯密研究的真意。

埃蒙·巴特勒完全避開了圍繞斯密的政治經濟學引起的眾多紛爭，多年來，已經出現了很多關於這方面的著述。斯密以獨特視角對直到十八世紀後半葉的英國社會的演化進行了綜合分析，而巴特勒在本書中通過講述斯密其人及其著作，又對這一分析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評價。

亞當·斯密先出版的是《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這本不太為人所知的書，17年後，《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下稱《國富論》) 一書才出版。人們根據這一時間間隔斷言斯密改變了主張，認為激勵人們行動的因素不再是具有道德價值的善行，而是沒有是非區分的私利。不過，從其姓名不詳的學

1 蓋文·甘迺迪 (Gavin Kennedy) 是赫瑞瓦特大學 (Heriot-Watt University) 榮譽退休教授，著有 *Adam Smith's Lost Legacy* 一書，由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公司於 2005 年出版。

生們在 1762 到 1763 年間記下的斯密講課筆記中，我們了解到斯密講義中大部分內容幾乎一字不差地重新出現在了 1776 年出版的《國富論》中。他把倫理學講義(1751-1762)整理成《道德情操論》於 1759 年出版。因此，亞當·斯密在人類行為動機問題上並沒有自相矛盾。

斯密是道德哲學家。在十八世紀，經濟學還不是一門獨立學科，直到十九世紀晚期它才獨立出來。誠然，斯密之前以及他同時代的許多人都寫過論述經濟問題的小冊子（耶魯大學存有數千份十六到十八世紀期間這樣的小冊子），並且有些作者對經濟學也有所貢獻，但就研究綜合性的廣度與深度來說，無人能出其右。

斯密之前的政治經濟學主要研究如何通過積累金塊和銀塊使君主和國家富有，為對外戰爭提供資金。《國富論》則把政治經濟學的重點重新放到通過“土地和勞動每年的產出”使消費者富有起來。《國富論》不是教科書，它專門探討財富的性質以及財富增長的原因。

《國富論》第一卷和第二卷講述人類社會的獨有特徵，例如人類交換的天性、勞動分工、生產要素、市場活力以及所有參與者之間的收入分配。第三卷把十八世紀英國納入到社會演化的背景中，描述了從原始的狩獵社會，經“畜牧”和“農業”社會，進化到商業時代，並表明五世紀羅馬的崩潰打斷了西歐這種“自然”發展的進程。

十五世紀後歐洲開始復甦，但其復甦卻受累於種

種政策，因為這些政策是為斯密所稱的“重商主義”（mercantile commerce）服務的。在《國富論》第四卷中斯密嚴厲批評了重商主義的主要錯誤。該理論認為國家的財富在於積累金塊和銀塊；貿易平衡之所以很重要是因為一個國家必須出口多於進口。更糟糕的是，該觀點認為，如果有保護性壟斷，對勞動力僱用和流動進行限制，並對自然的市場自由進行干預，那麼國內經濟就會更加強大。

斯密糾正這些錯誤的方法主要是解除對市場的干預，因為它改變了市場的自然運行機制。他力主允許人們把“土地、勞動力或資本”與其他要素結合起來，生產產品在市場上出售，從而擴大以競爭方式生產的產品的自由交換，使經濟自然增長。在支付地主地租、工人工資以及商人和生產者利潤後，資本擁有者會把其淨利潤重新投資到生產活動中，通過不斷的生產和交換，創造出真正的財富，因為它來自整個社會每年的勞動和土地產出。並且通過“流通之巨輪”不斷的循環，這種財富會繼續逐步緩慢增長。

在第五卷中，斯密論述了政府應當扮演的角色，詳述了其基本職能：國防、司法、促進商業的公共工程和機構、對“各個年齡層的人”的教育、應對“令人生厭的疾病”的措施、維護“君主尊嚴”、以及通過向受益人收稅和收費為這些開支提供資金（而不是通過發行公債）。

《國富論》論述了斯密時代特別具有破壞力的重商主義

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的演化過程：從羅馬帝國崩潰，到歐洲復甦，以及隨後 1,000 年間君主和封建制度下的民族國家出現。過去的 200 年間有很多人對斯密的著作進行批評，儘管他們條件有利——又做了 200 年的研究，但是，卻駁不倒斯密。

西歐大多數人非常貧困。他們主要因為赤貧和受迫害才移民北美、南非和澳大拉西亞的，這一過程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早期。斯密透過貧窮現象看到了其原因，也就是沒有創造財富。脫貧的辦法只能來自社會內部，即創造生產財富的條件。正是針對這一問題上，他將自己的歷史方法應用到了研究人類社會上。斯密通曉希臘和拉丁語經典著作，他在書中常常引用其中的例子和引言。和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中所有重要人物一樣，他是向後追溯社會的起源，而不是向前展望各種烏托邦社會。這種烏托邦式的浪漫主義在十九世紀蓬勃發展，而不是在十八世紀。

歐洲文明墮入暴君統治的野蠻狀態和封建社會，但是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斯密書中常用的片語）農業生產恢復了，人口增長了，商業交易也在一些零散的集市和市場重新開始了。1760 年之前的 100 年間，在家庭日用品方面，即使是在最窮的普通工人家庭中，相對而言也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富足”（很大程度上受益於二手交易），這比北美狩獵部落以及他們最有權勢的“酋長”都富足。來自旅行者的傳聞，再結合對寇克卡迪（Kirk caldy）附近小的釘針廠和

鐵匠鋪的觀察，斯密發現真正財富的創造並不是生產金塊和銀塊，而是生產和分配那些粗糙的土地及社會勞動的產出。這些產品開始在勞動者的家裏出現，這才是一個國家相對富足程度的真正的晴雨表。

斯密最初的洞見並不是發現了勞動分工，這一“榮譽”最早歸於柏拉圖，而“現代”則歸於威廉·佩第爵士（Sir William Petty, 1690）。斯密的貢獻是認識到勞動分工的重要意義，通過勞動分工，真正的富足可以普及到人口中的大多數，而不是僅僅惠及最富有的人。這樣，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後，使所有人都逐步更加富裕。

這使他發問：如果勞動分工是致富關鍵，那麼，在甚麼條件下才會增加產出？每個人的分配份額如何確定？有甚麼障礙阻礙這一過程？最後一個問題很關鍵。斯密實現了從描述問題到分析問題的飛躍，他也因此邁出了通向經濟學這門新科學基礎的第一步。

我下面簡單總結一下斯密提出的完全自由條件下的商業經濟模式，作為後面巴特勒所寫的精彩介紹的補充。

在商品社會中，通過勞動分工生產出的適銷產品得以交換。物物交換，即直接但低效的以物換物，其出現比通過錢幣進行的更為高效的間接交換要早很多。幾千年前古代文明社會中就出現了錢幣，這表明由於勞動分工，商業就出現了（否則他們要錢幣幹甚麼呢？）。

最早的交換是農村產品（糧食和原材料）和小城鎮產品